

# 日本校园欺凌的社会问题化:成因、治理及其启示

高晓霞<sup>\*</sup>

〔摘要〕 校园欺凌既是一个古老的社会现象,也是当今世界普遍性存在的社会问题。日本校园欺凌现象同样由来已久,并且已经社会问题化了,具有高发生率和高危害性的特征。日本校园欺凌现象的社会问题化,既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也有其教育病理诱因,还有其群体行为构造。为此,日本主要通过法制路径处置校园欺凌、强化学校德育预防校园欺凌、借助协同治理应对校园欺凌。研究并反思日本校园欺凌的成败得失,对于我国校园欺凌现象的治理无疑具有启迪价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日本;校园欺凌;社会问题化;教育病理;治理

所谓校园欺凌,在其最一般的意义上,就是指在校园中发生的或者直接与校园相关的学生群体中持续性的恃强凌弱、以大欺小、以多欺少的冲突现象。导致日本社会中“校园欺凌”现象滋生和蔓延的原因很多而且也非常复杂,只有进行深层次的理论分析,对症下药,综合治理,才有可能实现根治。研究并反思日本校园欺凌的成败得失,对于我国校园欺凌现象的治理无疑具有启迪价值和借鉴意义。

## 一、日本校园欺凌的社会问题化及其社会危害

近年来,日本“校园欺凌”事件频繁发生,并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实际上,日本校园欺凌现象已经社会问题化了。所谓社会问题化,主要是指其产生的多因性、程度的严重性、影响的广泛性及对策的综合性。日本的中小学里普遍存在欺凌问题,有些甚至发生在幼儿园里,并且已经危及到受欺凌学生的生命。

1. 日本校园欺凌问题分析。本文所讨论的欺凌(bullying),即日文中的“いじめ”(罗马字写为ijime,日本汉字写作苛め、虐め,平假名写作イジメ,谐音就是“异己灭”),具有对弱者反复进行心理上、言语上和肉体上的攻击、摧残和虐待之意,主要是指学校教育过程中在学生之间所发生的冲突现象。日本社会学者、大阪市立大学名誉教授森田洋司(もりた ようじ、1941—)和科学警察研究

---

<sup>\*</sup>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210023;南京审计大学大外部副教授,211815。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路径研究”(13BZZ032)及南京审计大学政府审计研究基金重点课题“基于国家治理的中日审计制度比较研究”(GASA161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所犯罪行为生态学者清永贤二（きよなが けんじ）研究认为，欺凌是指“同一集团内互动关系中处于优势的一方故意地或者集体性地给另一方带来精神上、身体上的痛苦。”<sup>①</sup>森田洋司还提出了关于校园欺凌的“四层构造”理论，将日本校园欺凌现象的构造分成四层，从最里层到最外层分别是：被欺凌者、欺凌者、观众、旁观者。<sup>②</sup>在森田模型中，“观众”是指没直接欺凌别人，但在看见别人被欺凌时，起哄、鼓噪、幸灾乐祸的人，其对欺凌行为的态度是积极认可；“旁观者”是指看见别人被欺凌，却视而不见的人，其对欺凌行为的态度是默许支持。如果有学生看见别人被欺凌时，勇于充当“调停者”、“制裁者”，或者表示出否定欺凌行为的态度，也会对欺凌行为有抑制作用，成为欺凌行为的“抑制者”；反之，当看见别人被欺凌时，起哄、鼓噪、视而不见就会助长欺凌行为，成为欺凌行为的“强化者”。森田模型强调了欺凌行为的群体性特征和关系性实质，以及被欺凌者的弱势性特征和易受攻击性的现实处境，同时也指出了观众和旁观者对于欺凌行为的助长作用和抑制作用。在此基础上，广岛经济大学饼川正雄（もちかわ まさお）教授又提出了关于校园欺凌的“六层构造”模型，强调了校园欺凌问题中的“首谋者”以及“教师与监护人”的作用。<sup>③</sup>

日本文部省（2001年与科学技术厅合并成为文部科学省，即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XT）曾经在1991年将欺凌界定为“对比自己软弱的人单方面地、持续性地施加身体上、心理上的攻击，使对方感到深刻痛苦，学校已确认其事实的行为。”迫于校园欺凌日益严重的巨大社会压力，又先后将“经过事实认定”修改为“从受欺凌学生的立场判断”、将“发生件数”修改为“认知件数”，从而有利于更准确地确认校园欺凌事件、更有效地保护受欺凌学生。确实，如果像文科省界定的那样从当事人感觉出发认定欺凌的话，那么什么是欺凌就变得容易判断了。同时，校方想要掩盖欺凌也变得难了。但是，如果把欺凌的判断只是任凭受害者主观判断的话，那么有很多第三方不认为是欺凌的事件也因为受害人主观判断而不得不作为欺凌，那样的话，欺凌的范围就可能扩大，导致正常的人际关系也难以实现。<sup>④</sup>

日本校园欺凌问题具有一些典型特征。日本武库川女子大学教育研究所小林刚（こばやし つよし）指出，现今的校园欺凌事件比以前更具有隐蔽性、长期性，欺凌者表现出手段残忍化和将欺凌理由正当化的倾向。<sup>⑤</sup>校园欺凌作为一种攻击性行为之所以长期存在，一个方面的原因就因为它同时是一个隐蔽的问题，常常被遮蔽在校园亚文化之中。关于校园欺凌发生的地点，日本千叶商科大学政策情报学教授田中美子（たなか よしこ）认为，校园欺凌多发生在教室里。<sup>⑥</sup>但是，由于欺凌行为的隐蔽性程度越来越高，日本校园欺凌也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厕所、走廊、操场等监控死角，且多发生在同年级甚至同班同学之间。另外，欺凌行为的隐秘性也与很多受欺凌学生往往不愿意向家长和老师如实反映欺凌的实际情况有关。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老师和家长常常只是批评教育施暴的欺凌者，而这可能会导致被欺凌学生将来受到更严重的欺凌，造成欺凌行为的恶性循环和不断升级。日本爱知学院大学心身科学部酒井亮尔（さかい りょうじ）认为，欺凌行为的特征包括阴暗性、残忍性、纠缠性。<sup>⑦</sup>诚然，

① [日] 森田洋司・清水賢二（1994）『いじめ—教室の病い—』金子書房、6—24 ページ。

② [日] 森田洋司（2012）『いじめとは何か 教室の問題、社会の問題』中央公論新社刊、132—133 ページ。

③ [日] 餅川正雄（2011）『学校におけるいじめ問題に関する研究（IV）』『広島経済大学研究論集』第34巻第2号、65—84 ページ。

④ [日] 小林英二・三輪壽二（2013）『いじめ研究の動向——定義といじめ対策の視点をめぐって』『茨城大学教育実践研究』第32号、163—174 ページ。[日] 新保真紀子（2008）『現代のいじめ——大阪子ども調査を中心に』『児童教育学研究』第27号、24—39 ページ。[日] 堀出雅人・原清治（2010）『子どもたちにおける友人関係の変化—1.5次集団の形成とネットいじめの実態から—』『佛教大学教育学部学会紀要』第9号、235—244 ページ。

⑤ [日] 小林剛（1985）『いじめを克服する—教師への期待—』有斐閣。

⑥ [日] 田中美子（2010）『「いじめ」のメカニズム』世界思想社。

⑦ [日] 酒井亮爾（2006）『学校におけるいじめに関する一考察』『愛知学院大学論叢・心身科学部紀要』第1号、41—49 ページ。

青少年学生同辈群体间的偶尔捉弄、嬉戏玩笑是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也是其成长的必经过程,但是,欺凌行为一旦发生,就会反复出现,长期纠缠。欺凌者往往认定受欺凌者不敢也不可能将受欺凌情况报告家长或老师,因此,他们会反复地把被欺凌者作为攻击对象。铃木文哉(すずき ふみや)和赤坂真二(あかさか しんじ)发现,与其他国家的校园欺凌现象相比,日本初三学生中欺凌持续时间达四个月的比例在40%以上。<sup>①</sup>此外,被欺凌的对象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日本社会学者、筑波大学人文社会系土井隆义(どいたかよし)教授认为,被欺凌者具有不确定性,一方面,畏缩不前者会被欺凌,另一方面,多事多嘴者也会被欺凌。“如今的欺凌并非由于性格上的偏执而起,无论何地、无论是谁,都有可能出现欺凌现象。”<sup>②</sup>

2. 校园欺凌问题的高发生率。众所周知,“校园欺凌”现象在世界上很多国家中都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日本“校园欺凌”问题尤其突出。在日本,欺凌现象也并非突然出现的社会现象,而是由来已久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欺凌现象就成为日本国内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日本立正大学心理学部教授冈本淳子(おかもと じゅんこ)指出,1980年代以后由于校园欺凌问题导致自杀和伤害事件而引起传媒的广泛关注。<sup>③</sup>日本政府和社会各界也都非常重视校园欺凌问题,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并没有找到防止和减少校园欺凌的有效方法,以至于校园欺凌愈演愈烈,成为日本社会病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心理学者詫摩武俊(たくま たけとし)明确指出,与过去相比,如今的欺凌现象则远为严重。<sup>④</sup>在日本,时常有学生不堪校园欺凌而拒绝上学甚至自杀的新闻出现,甚至连皇太子德仁亲王的女儿爱子公主在学校也曾遭受到欺凌。日本著名教育评论家、法政大学教授尾木直树(おぎ なおき、1947—)将日本校园欺凌问题社会化的历史分为三个高峰(ピーク)时期:第一次高峰期是从1984年至1987年左右;第二次高峰期是从1994年至1996年的三年期间;第三次高峰期是2006年左右开始的。<sup>⑤</sup>日本爱媛大学法文学部人文学科竹川郁雄(たけかわ いくお)教授也对日本校园欺凌现象的发展演进作出大体上相同的三个时期的划分。<sup>⑥</sup>2011年发生的滋贺县大津市中学生自杀事件以及其他中小学发生的因欺凌而自杀或自杀未遂事件,促使学者们进一步深入反思校园欺凌问题的严峻性。根据中京大学学者长尾英彦(ながお ひでひこ)的考察,日本教育学者和教育法学者们开始将校园欺凌行为的高发生率概括为“四波”:1980年代中期为“第一波”、1990年代中期为“第二波”、2000年代中期为“第三波”、2011年以后又出现“第四波”。<sup>⑦</sup>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2015年(平成27年)10月27日最新发布的有关校园欺凌的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度(平成26年)小学、初中、高中以及特别支援学校发生的已认定的校园欺凌事件共有188,057件,比上一年度(即2013年的185,803件)增加2254件。据2017年2月28日日本文科省公布的数据,日本2015年共有37,960所中小学校(包括国立、公立、私立和特校)发生了225,132起校园欺凌事件。<sup>⑧</sup>

3. 日本校园欺凌问题的高危害性。在日本,校园欺凌已经变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校园欺凌事件不时演变为校园学生暴力案件,其中还有一些性质相当恶劣的案件。案件中那些心灵被扭

① [日] 鈴木文哉・赤坂真二(2015)「いじめが起きにくい学級をつくる教師の働きかけに関する事例的研究:集団づくり導入期における教師の指導行動に着目して」、『上越教育大学教職大学院研究紀要』第3巻、1—10ページ。

② [日] 土井隆義(2008)『友だち地獄—「空気を読む」世代のサバイバル』筑摩書房、20—22ページ。

③ [日] 岡本淳子(2005)「いじめ問題に関わる教師の認識についての一考察—臨床心理士による教員研修への視点から—」、『立正大学心理学研究所紀要』(3)、1—21ページ。

④ [日] 詫摩武俊(1984)『こんな子がいじめ、こんな子がいじめられる』山手書房。

⑤ [日] 尾木直樹(2013)『いじめ問題をどう克服するのか』、岩波書店、13ページ。

⑥ [日] 竹川郁雄(2010)「戦後日本社会におけるいじめ問題についての一考察」人文学科編『愛媛大学法文学部論集』第28号、137—150ページ。

⑦ [日] 長尾英彦(2014)「いじめ問題に関する覚書」『中京法学』第48巻3・4号、75—97ページ。

⑧ 日本文部科学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mext.go.jp/b\\_menu/houdou/29/02/\\_icsFiles/afieldfile/2017/02/28/1382696\\_001\\_1.pdf](http://www.mext.go.jp/b_menu/houdou/29/02/_icsFiles/afieldfile/2017/02/28/1382696_001_1.pdf))参照。



曲的孩子们作案手段之残忍,令人触目惊心。首先,校园欺凌直接危害受欺凌者的身心健康。在校园欺凌事件中受欺凌的学生通常在身体上和心灵上遭受到严重的双重创伤,并且容易在其身心两方面留下阴影,甚至导致学生自杀或濒于自杀的边缘。相关研究指出,欺凌通常会影响受害者的身体健康,受到欺侮的学生通常伴随有失眠、尿床、忧郁并且经历更多的头痛和胃痛。立花正一(たちばな しょういち)研究发现,青春期的受欺凌经历对其精神状态产生长期影响,直至导致一些身心病(psychosomatic disease)、神经症、精神病。<sup>①</sup>确实,校园欺凌中孤立、讥讽、嘲笑、谣言及身体暴力的受害者会显得孤独无助。日本埼玉大学教育学部坂西友秀(ばんざい ともひで)教授研究认为,受害者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会导致焦躁、无气力、不安、抑郁、自尊心受损、对他人的厌恶感、恐惧甚至绝望等反应与症状。<sup>②</sup>其次,校园欺凌同样危害同学关系。实际上,校园欺凌不但对“受欺凌者”造成伤害,而且对“欺凌者”和“旁观者”同样造成伤害。“欺凌者”由于长期欺负别人,内心得到极大满足,以自我为中心,对同学缺少同情心,而“旁观者”会因为帮不到受害者而感到内疚、不安,甚至惶恐。日本宫崎大学教育文化学部冈安孝弘(おかやす たかひろ)等人根据实证研究指出,整个加害者群体中不开心、生怒气和无精打采的程度都很高。<sup>③</sup>此外,校园欺凌还会危害班风、校风和社会风气。东京成德大学深谷和子(ふかや かずこ,1935—)列举了校园欺凌的多方面危害,<sup>④</sup>日本校园欺凌造成了“学校恐怖症”,并且衍生了“不登校(ふとうこう)”或称为“登校拒否(とうこうきょひ)”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和教育病理现象。

## 二、日本校园欺凌问题的成因分析

从表面上看,日本校园欺凌事件的起因千奇百怪,可能只是因为欺凌者看对方不顺眼,因为觉得对方长得丑一些,或者怀疑对方跟自己喜欢的异性走得近一些,甚至是因为对方失误踩到自己等等,不一而足。其实,日本校园欺凌事件频频曝光背后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如家庭、社会成长环境中负面因素影响、法制教育弱化、针对未成年人校园欺凌行为的管教执法力度不严,以及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突出等等。

1. 日本校园欺凌的历史文化溯源。诚然,校园欺凌发生在校园,但是,校园并不能独立于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之外。日本学艺大学教授杉森伸吉(すぎもり しんきち)认为,日本校园欺凌事件频发的原因在于日本社会集体主义式自我防范的文化,而欺凌问题在崇尚个人主义的国家就相对缓和一些。日本人为避免不被其他人讨厌,具有强烈的自我批评及改进意识,倾向于改正自己的缺点,与周遭同伴保持步调一致。无法融入集体的人常被视为“弱者”“异类”,这些人甚至转校生都可能成为被欺凌对象,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sup>⑤</sup>虽然“村八分(むらばちぶん)”作为一种陈规陋俗早已被废除,但是其所带来的影响却依然充斥于日本社会之中,校园也不例外。“村八分”的核心与实质就是集体欺负和惩罚,充分体现在当今的日本校园欺凌行为中。如果一个学生在能力、性格或者相貌等方面被认为与众不同,就很容易会被自然而然地隔离在同学之间的日常交流之外,以示惩罚。日本社会教育学者黑

---

① [日]立花正一(1990)「いじめられ体験」を契機に発症した精神障害について」『精神神経学雑誌』第92巻第6号、321—342ページ。

② [日]坂西友秀(1995)「いじめが被害者に及ぼす長期的な影響および被害者の自己認知と他の被害者認知の差」『社会心理学研究』第11巻第2号、105—115ページ。

③ [日]岡安孝弘・高山巖(2000)「中学校におけるいじめ被害者および加害者の心理的ストレス」『教育心理学研究』第48号、410—421ページ。

④ [日]深谷和子(2006)「子どもの「いじめ」問題—児童臨床の立場から事例をもとに—」『子ども社会研究』第12号、106—123ページ。

⑤ 贾文婷:《日本,校园欺凌难治愈》,《人民日报》2017年2月21日第22版。

泽惟昭(くろさわ のぶあき, 1938—)说:“现代日本的道德一方面强调与市民社会的物质主义相适应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道德,另一方面又要强调建立在‘天皇教’基础上的共同体(国家)道德。如果贯彻前者的话,现在日本的国家就有崩溃的可能性。那样,对当权者来说,连本带利都会赔光。此外,如果过度强调后者的话,又会招致青年人的反抗,成为企业活力的障碍。”<sup>①</sup>在这种同调主义历史文化传统和现代自由主义社会思潮的双重作用下,就不难理解当发生校园欺凌和校园暴力事件的时候,一些学生耳闻目睹事件的发生,不但没有及时劝阻和制止,反而抱有“不关自己的事”、“不惹是非”、“不管别人闲事”的想法和态度,甚至还抱有一种麻木不仁的“看客心理”和“幸灾乐祸”的态度。日本大谷大学蜂屋良彦(はちや よしひこ)指出,校园欺凌严重化的社会原因在于长期的需求不满足、缺乏耐心以及对他人痛苦的漠不关心。<sup>②</sup>在某种程度上说,日本校园欺凌现象的社会问题化有其独特的历史传统渊源、尚武文化根基和现实社会背景。

2. 日本校园欺凌的教育病理诱因。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校园作为社会化机构是实施学校教育的主要场所。而在学校教育中,教师无疑是主要的教化者,不但要教授科学文化知识,而且传授学生为人处世的能力。但是,日本以升学为中心的教育观扭曲了学校教育,特别是弱化了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和规则教育。以知识学科为中心的评价体系和应试体制忽视了对学生其他方面能力的培养,导致其容易产生逆反心理和偏差行为。一些学者如尾木直树等人则直接把日本校园暴力事件的激增看成是填鸭式教育酿成的悲剧。在巨大的课业压力下,如果没有全面的教师指导和及时的心理疏导,极易导致一些学生选择以极端形式释放这些压力。日本教育社会学者、大阪大学人间科学研究科秦政春(はた まさはる)教授认为,对于应对校园欺凌的指导,不仅仅只是“知识注入型”的实践,教师的言传身教和态度尤为重要。学校的主要职能属于道德社会化的领域。与以知识技术指导为主的认知社会化不同,没有适切规范的(道德的)环境,这种指导是非常困难的。<sup>③</sup>近年来日本的教师问题,尤其是“指导不適切教师”也成了困扰日本教育的重要病理现象。日本名古屋大学教育学部教授今津孝次郎(いまづ こうじろう)指出,指导力不足着眼于教师个人的表现,表明该教师的资质与能力(专业知识、授课能力和人际关系能力等)的低水平。与其相对的是,指导不適切侧重于跟学生学习相关的授课及指导问题基础上的不適切性,因而不单单只是教师个人资质能力方面的问题。考虑其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考虑其与监护人之间关系的不適切性。<sup>④</sup>由此看来,指导不適切说到底应属于教师指导在关系方面出现的问题。日本学者谷口政己(たにぐち まさみ)指出,指导不適切教师未必就是发生丑闻的教师,但是,对学生性骚扰、体罚等自不待言,违反校园规则给学生造成伤害以及突发酒驾或盗窃行为的事后指导也存在障碍。<sup>⑤</sup>由于受自由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日本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推行宽松(ゆとり)教育政策,造成了诸如“授课不成立”、“授课功能不全”、“班级崩溃”等教育病理现象。在宽松教育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下,不仅学生及其家长对学校教育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管理不满,而且教师在指导上产生了种种困惑。日本学者八尾坂修(やおさか おさむ, 1951—)认为,教师处理校内暴力、学生欺凌、学生不上学等病理问题时感到困惑。<sup>⑥</sup>

① [日] 黒沢惟昭(1989)『国家と道徳・教育物象化事象を読む』青弓社、187ページ。

② [日] 蜂屋良彦(1986)「『いじめ』深刻化の社会的要因は何か」『学習指導研修』第8巻第11号、52—55ページ。

③ [日] 秦政春(1999)「いじめ問題と教師: いじめ問題に関する調査研究(Ⅱ)」『大阪大学人間科学部紀要』第25巻、235—258ページ。

④ [日] 今津孝次郎(2008)「指導が不適切な教員」の教師教育政策」日本教育社会学会第59回大会報告配布資料、107—108ページ。

⑤ [日] 谷口政己(2009)「教員に求められる資質と「指導が不適切である」教員について」『四天王寺大学紀要』第47号、89—98ページ。

⑥ [日] 八尾坂修(2004)『学校改善マネジメントと教師の力量形成』東京第一法規、第126、132—133頁。

3. 日本校园欺凌的群体行为构造。我们分析校园欺凌的成因,当然离不开对现时代的社会心理环境的考察。日本教育心理学者石毛みどり认为,现代社会是压力社会,20岁至50岁的人当中近六成的人平常都感到压力大,学生也不例外。中小學生中半数以上的人都表示有容易疲劳的压力反应。<sup>①</sup>面对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社会心理压力氛围,成人世界中既有扛不住压力而“过劳死”的,也有一下班就泡在居酒屋借酒消愁的,还有在家中实施家庭暴力的,等等。同样,面对学习压力的学生也会通过情绪转移以缓解心理压力,甚至产生暴力行为倾向。日本名古屋大学研究生院心理学教授速水敏彦(はやみず としひこ)指出,日本的年轻人中既存在着自我萎缩的心理,即对自己的自信度与满意度不足。同时,也存在一种假想的有能感(Assumed Competence, AC),即自我膨胀、行为傲慢、轻视他人,甚至有犯下杀人案的年轻人竟然面不改色地声称只是“想杀个人试试”。速水敏彦和小平英志认为,在假想的有能感比较高的人当中,展示攻击性幽默,以伤害他人之乐的情形较多。<sup>②</sup>其实,日本校园欺凌的高发生率与欺凌群体独特的集团心理以及群体性行为倾向也密切关联。因此,需要从欺凌群体的行为构造进行分析。日本大阪府八尾综合医院护理部长原英树(はら ひでき)也指出,关于学生欺凌现象的研究,要考察欺凌群体的整体,包括加害者、强化者、援助者以及防御者、旁观者、受害者及其行为倾向的力学关系。<sup>③</sup>当然,青少年纠合在一起的初期不一定形成欺凌群体或者犯罪团伙。但是,这些小团体一旦形成,就具有自组织的一般发展规律,并且出现孩子王(ガキ大将),团体氛围和非正式规范逐渐产生压力和约束力,成员在行动上具有同调性。团体内部自然出现的分层化过程使得弱势群体互动中极易受到欺凌,并且由于团体行动的同一体性、封闭性<sup>④</sup>和隐秘性而难以被团体外部发觉,因而不断得到强化。

### 三、日本校园欺凌问题治理

诚然,任何形式的校园欺凌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如何应对日益严重化的校园欺凌问题,日本各界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和不同流派的观点。具体说来,日本校园欺凌治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1. 通过法制路径处置校园欺凌

自1980年代中期日本校园欺凌社会问题化以来,其所采取的对策一直是在政府行政管理层面上加以处置和应对。如文部省在1985年就曾印发过《加强关于中小學生欺凌问题指导的通知》,1995年出台了《解决欺凌问题当前应当采取的方策》,2006年又印发了《关于欺凌问题的紧急建议——面向教育相关人员和国民》。但是,这些行政法规未能有效防范、应对和遏制校园欺凌的发生。2011年,滋贺县大津市一名初二男生不堪忍受校园欺凌而自杀身亡,震惊了日本社会。此次校园欺凌事件也被认为是日本就校园欺凌问题专门立法的重要背景。<sup>⑤</sup>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日本国会于2013年通过了《校园欺凌预防对策推进法》(いじめ防止対策推進法),首次把防范、处置与应对校园欺凌事件纳入法制化轨道。该法共有6章和一个附则。第1章是总则,主要规定了该法的目的、定义、基本理念,禁止校园欺凌,规定了国家、地方公共团体、学校设置者、学校及其教职

①[日]石毛みどり(2010)『中学生のレジリエンシー:3つの特性をもとにした類型化』白梅学園大学短期大学教育・福祉研究センター研究年報第15号、12—24ページ。

②[日]速水敏彦・小平英志(2006)『仮想的有能感と学習感および動機づけとの関連』『パーソナリティ研究』第14号、171—180ページ。

③[日]原英樹(2008)『いじめの集団的性質と指導上の問題点』『神奈川大学心理・教育研究論集』第27号、79—85ページ。

④[日]田中美子(2009)『いじめ発生及び深刻化のシステム論的考察』『千葉商大論叢』第47巻第1号、31—63ページ。

⑤[日]小西洋之(2014)『いじめ防止対策推進法の解説と具体策』WAVE出版、4—5ページ。



员、监护人等的责任和义务。第2章是防止校园欺凌的基本方针等。第3章是基本的实施对策,规定了学校防止、早期发现校园欺凌的措施,相关机构的协同措施,教员应对校园欺凌的素养与能力提升,以及网络欺凌的应对措施。第4章是防止校园欺凌的相关措施,规定学校要成立防止和应对校园欺凌的组织,成员中必须有两名以上教职员(複数の教職員),并且得到心理学、福利学等相关专门知识拥有者的协力。学校对校园欺凌可以采取惩戒权、停学制度等。第5章是重大事态的应对和处置。第6章是杂则。<sup>①</sup>诚然,在日益严重的校园欺凌问题面前,日本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学校以及社会各界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处置和化解校园欺凌事件,从防止学生受教育权被侵害的视点出发,通过法制途径应对校园欺凌,坚持早预防、早发现、早应对的基本方针。可以说,《校园欺凌预防对策推进法》的制定与实施,标志着日本在应对和处理校园欺凌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上初步实现了法制化。但是,无论是立法过程、实施过程,还是法律内容本身,都存在诸多问题,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议论和批评。日本政策智库PHP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龟田彻指出,应对社会问题化了的校园欺凌现象,必须要社会全体成员的广泛讨论。可是,在《校园欺凌预防对策推进法》制定过程中,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没有对国民进行充分说明,相关信息也是碎片化的,法律制定过程是不透明的。<sup>②</sup>石井小夜子(いしい さよこ)律师明确指出,《校园欺凌预防对策推进法》忽视了校园欺凌的构造以及产生校园欺凌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她甚至怀疑,这部法律是否抓住了校园欺凌问题的真实情况。<sup>③</sup>毫无疑问,论证不周全、讨论不充分的法案,在其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问题,如第三方调查机构的中立性和公平性问题、学校教育过程中教师应对欺凌问题的精力和能力问题、停止听课处罚措施与受教育权冲突问题、向学校派出警察的可行性与必要性问题以及网络欺凌如何有效应对问题,等等。

## 2. 强化学校德育预防校园欺凌

在校园欺凌事件中,对于身体、行为上的欺凌行为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加以解决。但是,对于心理、精神方面的伤害则难以利用法律手段进行维权。正如日本驹泽大学教育社会学者伊藤茂樹(いとう しげき)教授指出的,校园欺凌问题说到底还是心的问题。<sup>④</sup>所谓心的问题,也就是在私德、公德方面出现了偏差。在解决这些心理、道德方面的问题时,法律常常无能为力。因此,就需要通过道德教育来培养学生的私人生活的道德意识及行为习惯,防止发生道德行为偏差,制止不良道德行为。日本道德教育方法学会会长渡边满(わたなべ みちる)等人认为,强化学校道德教育是治理校园欺凌问题的重要路径。<sup>⑤</sup>日益严重的校园欺凌问题也促使日本政府反思德育在教育改革中的地位。《校园欺凌预防对策推进法》明确规定了要在学校设立欺凌事件咨询室,并加强学生道德教育。2013年文部科学省在“关于充实道德教育的恳谈会”上正式把“道德学科化”作为议题,主张用强有力的手段培养学生的“道德性”。2015年日本正式宣布将在中小学实行“道德学科化”,把德育上升到和国语、数学等学科同等重要的高度。<sup>⑥</sup>

问题在于,日本右翼政客为了在国民中培养虚假的民族自豪感,甚至不惜以错误的历史观让国民失去正确认识并认真反省本国侵略历史的心态。二战后为防止军国主义思想复活,日本曾将《教育敕语》排除在教育领域外。但是,在最近的“森友学园事件”中,媒体揭露出该学园竟然强迫儿童背诵象

① 日本文部科学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mext.go.jp/ijime/index.htm>)参照。

② [日] 亀田徹(2013)「いじめ防止対策推進法の問題点を考察する」PHP総研『PHP Policy Review』第7巻65号、1—7ページ。

③ [日] 石井小夜子(2013)「いじめ防止対策推進法の問題点」『相談室だより』第1号、1—5ページ。

④ [日] 伊藤茂樹(1996)「心の問題」としてのいじめ問題」『教育社会科学研究』第59集、21—37ページ。

⑤ [日] 渡邊満・相模界(平成7年)「生活世界の再構成としての教育の革新—いじめ克服のための道德教育の構想—」『兵庫教育大学研究紀要,第1分冊,学校教育・幼児教育・障害児教育』第16巻、40—41ページ。

⑥ 丁英顺:《日本是如何应对校园欺凌的》,《世界知识》2017年第2期。

征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敕语》。不仅如此,右倾化的安倍内阁还公然别有用心地通过决议,允许将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作为日本教材的内容。众所周知,社会一旦为错误的历史观和虚假的民族自豪感所笼罩,人们就只会盲信国家权力和政府行为。<sup>①</sup>教育如果偏离正确的价值观,其所培养的学生必然会失去恰当的判断力和行为约束力。在日本军国主义错误思想指导下,声称教育学生不要恃强凌弱,简直是痴人说梦,自欺欺人。

### 3. 借助协同治理应对校园欺凌

为了及时应对校园欺凌问题,无疑需要社会多部门的协同治理与综合施策。日本《校园欺凌预防对策推进法》第3章第17条规定,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要与相关中央与地方的其他省、厅机关、学校、家庭、社区以及民间团体等机构协同努力,共同整备,强化必要的体制以采取适当措施援助受欺凌儿童、学生及其监护人,对实施欺凌行为的儿童、学生及其监护人实施指导。换句话说,作为社会问题的校园欺凌单靠某一部门、组织和责任者是无法解决的,必须多部门联防联控、协同治理。国家机关、地方公共团体、学校、社区居民、家庭以及其他相关者如教育委员会、警察、法务局、儿童商谈所、儿童支援机构、志愿者组织等等,都应相互配合,协调一致地行动,才能有效解决校园欺凌问题。这一理念的规定使得校园欺凌问题的解决具有系统性和全面性,形成了国家、地方、学校、家庭、社区等五位一体的立体综合式问题解决体系。<sup>②</sup>其中,日本文部科学省要加强对教师进行有关校园欺凌问题的专门知识培训,增加合格学校辅导员和护理员的数量,以帮助学生处理各种问题。政府相关行政部门还要为相关校园欺凌问题的处置制定更加明晰的指导原则和程序。学校也要制定相关计划,对教职员工进行防止校园欺凌的技能培训,如临床教育和心理咨询等矫正方法,提升教师防止和应对校园欺凌的能力。监护人对子女的教育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监护人要努力指导被监护儿童养成规范意识,避免发生欺凌行为。监护人在其所监护的儿童受到欺凌后,要采取适当措施加以保护。国家、地方公共团体、学校设置者、学校在采取欺凌防止措施时,监护人要努力给予协助,当然,这些规定不能理解为是对尊重家庭教育自主性的改变。家庭教育应尊重家长的自主教育权。若过于强调监护人职责,可能引发学校方面急于构筑欺凌对策问题。<sup>③</sup>

日本教育学者、爱知教育大学教育学部名誉教授折出健二(おりで けんじ)等人提出,在预防校园欺凌的行动中,应该赋权(エンパワメント, empowerment)学生参与对话和相互支持。<sup>④</sup>

协同治理的要义是通过多元主体在共同处理复杂社会事务过程中的相互协调,消除彼此间存在的隔阂与冲突,实现共同行动,以最低的成本实现公共价值和长远利益。在应对校园欺凌社会问题化的过程中引入协同治理,也是为了有效解决问题。不过,日本政府却违背协同治理的民主理念,在安倍晋三2012年再次上台执政以来,把校园欺凌问题归咎于民主化的教育委员会制度。日本政府在“教育再生”的口号之下,强力推动新一轮教育委员会制度改革,并于2014年6月通过了《地方教育行政法改正案》。此次改革导致首长权限扩大,国家对教育的控制力加强。<sup>⑤</sup>其结果,民主化、分权化、中立化的教育理念被进一步严重削弱,民主主义的核心价值被民族主义所取代。在这样一种危险的动向和背景下,校园欺凌问题的恶性循环能否被彻底打破,实在令人担忧。

①高晓霞:《重新审视日本公民馆:历史谱系、目标偏差与功能错位——兼论我国公民教育的基本路向》,《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②向广宇、闻志强:《日本校园欺凌现状、防治经验与启示——以〈校园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为主视角》,《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③陶建国:《日本校园欺凌法制研究》,《日本问题研究》2015年第2期,第55—62页。

④[日]折出健二·福田八重(2004)「いじめの予防とエンパワメント～生徒相互の対話と支援～」『愛知教育大学教育実践総合センター紀要』第7号、271—278ページ。

⑤谭建川:《危险的“再生”:日本教育委员会制度的新改革》,《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6年第6期。



#### 四、日本校园欺凌问题的启示

我们研究日本校园欺凌问题及其治理实践,包括其核心理念、基本方针以及具体对策措施,应对、处置和化解校园欺凌事件的实际做法,并且深入反思其在校园欺凌治理过程中的成败得失。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揭开人家的伤疤和痛苦经历,而是要从中发现一些好的做法、得力举措和有益经验,以资借鉴。对于其历史问题、认识偏差和错误做法,我们也要深入分析,严正指明,坚决批判。

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的校园欺凌事件也时有发生,个别案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其结果严重损害了当事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其不良的社会影响。对于我国正在日益严重化的校园欺凌问题的治理,可以借鉴日本的有益经验,针对我国学校教育过程中校园欺凌的实际情况,分层分类,协同治理,重在预防。

首先,要在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强调坚持严格依法治校。在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的架构中,不断推进依法治校,提升法制意识,严格执行法律规章,制定规范的处置程序,充分保护学生的学习权等基本权利,从法律的高度出发保护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

其次,优化教育教学内容,强化学校德育的方式方法变革。加强中小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法律法规教育、校纪校规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建立旨在促进学生德智体美等各个方面全面发展并且能够有效防范校园欺凌的长效机制。

第三,实施协同治理。充分发挥学校、家庭和社区等多元主体的作用,坚持学校在“学校-家庭-社区”合作机制中发挥纽带作用,通过家长委员会、学校理事会等组织和机制影响家庭教育和社区参与。严格学校日常安全管理,建立早期预警、事中处理及事后干预的联动机制,分层分类、对症下药,并且综合施策、协同治理。

学生本人是实施校园欺凌行为的主体,因此,无论是加害者、受害者、旁观者,还是观众,所有的儿童、学生等都要深刻理解校园欺凌的危害,并且主动参与校园欺凌的预防、制止和应对,尤其是不应成为旁观者而无动于衷,或者置身事外,更不能幸灾乐祸,防止成为下一个欺凌的参与者或者被欺凌的对象。

(责任编辑:蒋永华)

### School Bullying as a Social Problem in Japan: Causes, Governance and Reflection

GAO Xiao-xia

**Abstract:** School bullying is not only an ancient social phenomenon but also a universal social problem in today's world. In Japan, school bullying also has a long history and has been a social problem characterized by high incidence and high risk. The social problem of campus bullying in Japan, showing a group behavior structure, is not only due to some profoun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auses but also caused by some educational pathological factors. Accordingly, Japan deals with school bullying mainly through the legal means, prevents campus bullying by strengthening school moral education, and copes with school bullying with the help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Research and reflection on Japan's school bullying, its success and failure, and its gains and losses, is undoubtedly valuable for the governance of school bullying in China.

**Key words:** Japan; school bullying; social problem; educational pathology; governance